

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

珍本



新列国志

(上)

I242.43

3

:1

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

明·冯梦龙 编辑
余图 常功 校点

新列国志

(上)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珍本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

总序

侯忠义

一、史传与历史演义

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从题材上来说，可分为三大主流，即：神怪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其中历史小说，顾名思义，当指以历史史实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小说。

先秦时期的《穆天子传》，写西周穆王姬满，西游昆仑，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可以视作历史小说的萌芽。《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考》、《青史子》等，可谓文言笔记体历史小说的开始。唐、宋、元出现的讲史平话，是历史小说的一大飞跃，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胚胎和雏形。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犹如一声春雷，宣告了历史演义的诞生。从此，历史演义就成了我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主要撰构形式之一。

“演义”，又作“衍绎”，即“衍绎史传”之意。所谓“按鉴演义”，就是彰明按史实敷衍故事；书名又曰“通俗”，是表明文字等与史书的不同。由《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先使用的“演义”一词，就体现了历史演义小说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明·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说：“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聚集而演，以通俗喻人，名曰演义。”明·陈继儒《唐书志传·序》也说：“演义，以通俗为义者也。”明代著名作家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说了相同的意思：“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命也。”这些话表明，历史演义无不标榜以“通俗”的形式来演义历史。其实这种“通俗”，是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极高要求的基础之上的，而史传正是演义小说内容上的主要依赖和根据。因此，明人把演义小说看作是可以“与经史并存”（陈继儒《列国志传·序》）的“羽翼信史”（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之作，把演义小说当成了通俗的历史读本。这一点，《三国志通俗演义》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没有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便无从谈起。《三国志通俗演义》署“晋平阳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就说明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自诩此书是从《三国志》演义而来。又如记隋唐间历史与人物的《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也明确宣布作者是广采史传编成的。林翰在其《序》中说：“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至于冯梦龙《新列国志》

的成书,就更为典型。吴门可观道人《序》云:《(新列国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肯定了据史传编撰演义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应当指出,成功的演义小说,它绝不是历史著作的重复和简单的移植,而是作者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进行的再创作。这表现在:精心剪裁、取舍材料,结构成首尾完整、脉络清楚的完整故事;增饰情节,细绘场景,渲染人物;将简练、质朴的文言文,改成群众化的通俗语体文等。当然演义小说作家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但它已充分说明,史传不等于演义小说,演义小说是对史传的再创作,也只有如此,才能满足读者对演义小说的审美追求。

二、历史演义的产生与发展

史传著作对历史演义无论从题材来源、结构形式、编撰方法,其中包括以人立传、按年记事的写法,以及精彩的语言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供了借鉴外,其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话本戏曲,都与历史演义有着因缘。尤其是讲史平话,它与历史演义都是从史著中滋生出来,可以说是同宗异派,由于话本成书在前,演义成书在后,演义又从平话中吸取了营养和借鉴。如在南宋说话艺术中,就有“讲史书”一家,“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

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平话小说是从说话中逐渐分离、独立起来的文人创作的讲史小说。鲁迅说:“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的莫如讲史。”(《中国小说史略》)并认为:“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应该承认,讲史平话小说对历史演义影响巨大,它们简直就是最初的章回体小说。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它的雏形。

《三国志平话》近六万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已达八十多万字,不仅作品的真实性大大提高了,内容无疑也更加丰富。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准确地比较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原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不过是删除了《三国志平话》中的荒诞不实之处,却无法否认《平话》与《演义》之间的联系,和《平话》对《演义》成书所做的贡献。如《三国志平话》共有六十九节插图标题,其中有二十八节为《演义》直接吸收。《平话》已有了统一的连贯情节,这便是《演义》的情节基础。《平话》中的主要人物诸葛亮、张飞、关羽、刘备、曹操,仍然是《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如《演义》保留了《平话》中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的一面,尽量削弱其鲁莽刚武、

仙风道骨的一面,使之更接近历史人物。《平话》中的主要情节,主要是写刘、曹集团的矛盾和斗争,以颂扬刘、关、张为主,很少写到东吴。《演义》通过进一步的构思,在《平话》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有关东吴的内容,使魏、蜀、吴三家军事力量与矛盾斗争,得到了充分、均衡地反映。特别是《演义》突出了曹操的形象,是一大进步。同时,《演义》接受了《平话》的爱憎倾向。《平话》在流传中带来的强烈的是非感、爱憎感,以及幽默诙谐的格调等,都为《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基础。又如《前汉书平话续集》之与《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武王伐纣平话》之与《列国志传》,都可以明显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列国志传》的前两卷,主要沿袭《武王伐纣平话》的细节描写,神魔怪异色彩十分浓厚;而对战争场面描写,又具有明显平话风格。如艺术上全用白话描摹,比喻形象、生动,音韵抑扬顿挫,节奏感很强等,就是保持了平话的特点。至于平话中的分卷立目的形式,用作评论的诗赞韵语,都为长篇章回体演义小说的最终形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毋庸置疑,元末明初是从讲史平话向演义小说的蜕变时期。演义小说的创作始于罗贯中。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演义小说的创作,无论内容与形式都起到了典范的作用。罗贯中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尚编有演义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十七史演义》等。明代中期,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活跃、科技的进

步、印刷事业的兴盛，演义小说的创作一片繁荣。正如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所云：“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林翰在《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中也说：“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强调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创之功，并把《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看作是踵武《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作。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接着产生了模仿罗氏之作的演义小说《列国志传》（余邵鱼）。此书以武王伐纣为开端，记叙春秋列国故事，体例、风格绝类罗贯中。余氏对演义小说的精刊与倡导，鼓舞起书贾的热情和读者的兴趣，而文人亦以创作此类小说来寄托各自的情怀，于是掀起了一股演义小说创作热。明中叶嘉靖至万历前后，新创与改编的演义小说不下二十余种，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有熊大木《南北宋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甄伟《西汉通俗演义》，谢诏《东汉演义传》、《全相按鉴演义东西汉志传》，无名氏《承运传》，杨尔曾《东西两晋志传》等。明末至清中叶，是演义小说创作的又一高潮时期，且作品出现了系列化的趋势。明末补订和续作的有冯梦龙《新列国志》、吴门啸客《孙庞斗志演义》、徐震《乐田演义》（即《前后七国志》）；取近事加以敷衍的

如《英烈传》、《续英烈传》。而补缺之作，如周游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钟惺（伯敬）的《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有商志传》，以及清人杜纲的《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吕抚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清中叶以后演义小说的沉寂和衰微，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文化专制有关，但近代出现了蒙古贵族尹堪纳希所撰元朝勃兴历史的《青史演义》，清末陆士谔反映清代全史的《清史演义》等。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社会全部朝代和重要史实，简直就可以构成一部中国历史的“形象”教材。“五四”以后，作为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余响，尚有新作出现，如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钟毓龙的《上古神话演义》、许啸天的《唐宫十二朝演义》、李伯通的《唐宫历史演义》、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等。

三、历史演义的特点

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区别其他历史小说的类型特征，这些特征表现为：内容的真实性、语言的通俗性和形式上的章回体。

内容的真实性，体现了演义小说反映历史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正如明代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所说，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尚好，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譬传诙谐之气，

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演义小说并不排斥虚构，但它的主要情节却是从史实出发，历史的纪实性，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也就是说，历史演义的作者的想象是有限的，虚构是受历史制约的，只能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地运用集中、夸张、熔裁等艺术手段。作者的态度是冷静、客观的，对人物的刻画和褒贬是以历史为根据的。由于小说的情节是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所以即使是细节的渲染和增饰，亦与历史的真实时间相符。历史演义题材上的这一基本特征，使它与以虚构为主的记人物传记的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杨家将通俗演义》、《隋史遗文》等明显不同，后者是属于历史小说的另一种类型，这是应该加以说明和区别的。

历史演义小说保持着通俗特色。通俗之意，一方面是表示演义小说浅显易懂，文字通俗晓畅，精炼优美；一方面还要求作品内容具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富有艺术感染力。正如甄伟在《西汉通俗演义·序》所说：“（演义小说）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正由于演义小说不仅“据正史”，还要“采小说”、“野史”，即吸收传说逸闻，以补正史之不足，这种带民间色彩的内容本身，就产生了“通俗”的作用，丰富了“通俗”的内涵，这是演义小说不容忽视的特点。

《三国志通俗演义》首创古代小说长篇章回的体裁。历史演义所采用的章回体，是在平话和史传两方面影响

下形成的。“讲史”由于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势必要分回讲说；平话作为书面形式的读物，也就按照古代图书的形式，分卷分篇叙述。通俗演义保留了这个特点，以此作为“通俗”的特色之一。另一方面，章回体的形成也和编年体、纲目体等史著体裁有一定的关系。小说中的分卷、分回，其作用与史书按年分卷标目，是完全相同的。章回体的叙事模式，打破了平话单线发展的情节结构，而采用了头绪众多的叙事模式，无疑是我国古代小说艺术上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至此，我们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概念，可以下这样的界定：

一、以叙一朝或几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多以正史编年为序；

二、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人物，以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为主要情节；

三、成书过程为世代累积型，大都有所借鉴和依托；

四、采用长篇章回体体裁，编年与纪传相结合的叙事方法；

五、叙述语言多用文、白相间的浅近的文言，人物对话也偶用白话。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历史演义的界定，是对这一小说类型的特点归纳、综合的结果，并不是说每一部历史演义都具有上述的特点；同时，也不能把这些类型特点绝对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框框，某一类型可能被突破，不同

类型之间也可能互相影响。我们这些意见，目的只在于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这一类型的作品而已。

四、历史演义的艺术与价值

修髯子在谈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用与影响时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展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作为形象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教育作用。史传的目的在于“资治”，演义的目的在于满足人们的审美追求。演义小说也是艺术。在“衍绎史传”、不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下，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刻画，对历史事件的敷衍润色，成为判断演义小说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消。”（《新列国志·凡例》）历史演义小说同样不能漠视作品所应有的愉悦功能和读者的审美期待。

我们本着这个目的，编辑了这套《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丛书》，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欢迎。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前 言

演叙春秋列国史事的章回历史小说《新列国志》，一百零八回。今存最早明代金阊叶敬池刊本，署“墨憨斋新编”，并有叶敬池识语。前有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叙》，及作者的《凡例》七条。墨憨斋即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耳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顾曲散人，及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末著名通俗文学作家。

冯梦龙少年英才，博学多识，颇有名声，他与兄梦桂、弟梦熊，并称“吴下三冯”。早年曾苦治《春秋》，以备科举，著有《春秋衡库》、《麟经指月》、《春秋定旨参新》、《别本春秋大全》等。后因科场蹭蹬，屡试不第，于天启二年(1622)回到故乡，进行了大量的通俗文学的创作。完成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改编了《三遂平妖

传》、《新列国志》，编纂了《古今谭概》、《情史类略》、《太平广记钞》、《智囊》、《太霞新奏》等，校刊过数十种传奇戏曲，编辑《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民歌集。崇禎三年(1630)，冯梦龙被选为贡生，出任丹徒县训导；崇禎十年(1637)，年已花甲的冯梦龙终于做了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算是一个好官。他还撰写了寿宁县第一部地方志《寿宁待志》。崇禎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接着明亡，冯梦龙惊震歌哭，关心时事，又为我们留下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两书。他死于清顺治三年(1646)，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是在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的基础上，重订和改编的。明代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八卷(又有陈继儒的批评十二卷本)，是作者在元刊《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等平话基础上，汲取民间有关列国史实的异闻传说，根据《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史传改编成书的。余邵鱼字畏斋，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大约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他以史为文，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叙述了商纣王即位至王翦灭楚，王赧图燕、齐的八百余年的历史，是长篇列国志小说的开山之作。

冯梦龙以敏锐的史学眼光、深厚的功力，以及精湛的艺术造诣，对余邵鱼的旧作重加辑演，改写成一部七十余万字的巨作——《新列国志》。他一是由商纣王开篇改为

从周宣王开始，至秦统一六国止；二是依据史书对小说内容与史实作了订正，删改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三是在语言文字、结构安排、细节描写与人物塑造上，做了较大的艺术加工。一变简朴、粗陋而为详尽、严密，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冯梦龙有感于“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如临潼斗宝之事，尤可喷饭。”（《凡例》）遂以《左传》、《国语》、《史记》为主，旁参《孔子家语》、《公羊》、《谷梁》、晋《乘》、楚《檮杌》、《管子》、《晏子》、《韩非子》、《孙武子》、《燕丹子》、《越绝书》、《吴越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刘向《说苑》、贾太傅《新书》等经、史、子著作，对《春秋列国志传》重新锻造，并对旧时地名、名物制度，依《一统志》等查明，分注于下，为与前志区别，特在书名前冠以“新”字。《新列国志》“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废兴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新列国志·序》）对史实内容加以精心结构，而“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即平铺直叙中，总属血脉筋节，不致有嚼蜡之诮。”（《凡例》）在艺术上同样达到了较高水平。

冯梦龙认为，是否有明君贤臣，是列国存亡的关键。正如齐国大夫甯戚所说，“臣闻：‘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第十八回）因此小说中塑造了雄视列国的五霸及其他有作为的君主形象，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

公、楚庄王、越王勾践与魏文侯、赵武灵王等，贤臣如：管仲、赵盾、百里奚、晏婴、西门豹、吴起、孙臆、廉颇、蔺相如、范蠡等，不仅对他们的心理活动作了细微抉剔，对其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亦做了传神描绘，使人物性格鲜明，形象栩栩如生。正面人物如此，反面人物亦是如此，同样使人难忘，在人物刻画上获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余邵鱼把《春秋列国志传》仅仅看成了一部历史的“宇宙帐簿”，是补经史之未赅，以期成为史传的通俗读本，故此在铺排史事、结构布局、细节描写等方面，剪裁失当，详略失宜，缺乏文彩。全书八卷中，五卷叙商末周初春秋事，三卷叙战国事，其中仅用六节篇幅写秦朝统一六国过程，显然布局失当，结构不够合理。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传》，为避免《春秋列国志传》叙事前后颠倒、详略失宜等结构弊病，借鉴了纪事体叙事方法，以历史时间的演进为主线，以八十三回的篇幅叙春秋五霸三百余年的纷争，以二十五回的篇幅叙战国七雄二百余年的争霸，采用虚实结合、详简并用的方法，增加了作品的史实容量和情节的丰富。作为羽翼信史的历史演义小说，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它的艺术魅力表现在哪里？那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敷衍润色，在细节描写上丰富多彩，使作品生动、逼真和富有情趣，从而增加感染力。

在敷衍润色史实的前提下，《新列国志》在细节描写、场景描绘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郑庄公掘地见母、鲍叔牙力荐管仲、晋公子重耳出亡、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

卧薪尝胆、孙庞斗智、冯媛弹铗、毛遂自荐、完璧归赵、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以及齐晋鞏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都成为大家熟知的脍炙人口的故事，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情趣。

清乾隆年间南京文人蔡元放，将《新列国志》略加润色，订正其中的某些错误，并附加大量评语，易名《东周列国志》刊行，遂成列国志小说中最通行的本子。

这次对《新列国志》的整理，是以《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的金阊叶敬池刊本为底本进行的，所缺部份，据覆刻本补齐。书中除明显的误字径加校改外，至于内容方面一概未动，以求保持原本的面貌。整理中的不当之处，敬希读者赐正。